

20

沈阳文史资料

革命史料专辑之二

1983. 6

目 录

红军老干部座谈西路军和农民运动情况	(1)
忆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后的情况	黄学祥 (17)
创建太谷第一支抗日武装	蒋克诚 (22)
我在清涧县闹革命的回忆	贺树槐 (37)
忆抗战前平山县地下党的领导机关	曹慕尧 (44)
回忆新兵营	姚德智 (48)
抗日武装花一枝	胡 毅 (53)
东征途中的一次战斗	陈万明 (67)
和辽公路伏击战	蒋克诚 (70)
忆河间县人民抗日斗争二、三事	刘 宪 (74)
攻占水冶城	蒋克诚 (81)
三门半山炮	蒋克诚 (90)
开辟密山县	陈万明 (100)
一个伪军大队的覆灭	刘 宪 (105)
回忆延安整风对我的教育	曹慕尧 (112)
安国县大五女地下党斗争情况	胡 毅 (125)
怀念陈毅军长	曹德连 (161)
当远离队伍的时候	司金明 (168)
三打徐塘圩	奚自立 (175)
在后勤某分部初建时	刘耀东 (180)

工农红军时的后勤工作片断	陈芳烈 (190)
朱德总司令来六八九团	李义明 (193)
鲁迅给党中央送火腿的点滴	刘耀东 (199)
我参加革命初期的经历片断	刘耀东 (207)
在彭总领导下工作	曹德连 (220)
我所看到的陈云同志	曹慕尧 (226)
回忆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	李明海 (249)
一一五师在鲁东南建立的铅印厂	吕本支 (253)
在莫正民起义前向罗荣桓同志的一次汇报	吕本支 (255)
“朱毛一条心”	马兴惠 (258)
朱总为我题了字	马兴惠 (261)
记朱瑞同志二三事	吕本支 (264)
粟裕师长领着我们练刺杀	曹德连 (267)
胜利完成征粮征草任务	李中柏 (270)

红军老干部座谈

西路军和农民运动情况

为了征集有关历史资料，根据党中央和全军党史资料征集《提纲》、《提示》的要求，沈阳军区后勤部党史征集办公室邀请一些红军老干部，先后用五个半天的时间，分两次座谈了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和有关闽、皖、赣、湘、鄂南方五省农民运动的情况。参加座谈的同志，当时都是一般干部，虽然对上层活动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了解得不全面，但是，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现将座谈情况整理如下：

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

参加有关西路军几个问题座谈会的人员，按姓名、现任职务和一九三六年职务的次序，分别介绍如下：

杜海林：后勤顾问（原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四方面军第九军交通队队员。

莫异祥：后勤顾问（原大连军医学校校长），四方面军第三十

一军九十三师卫生部调剂。

姚德智：后勤研究员（原运输部副部长），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的警卫员。

林春芳：后勤研究员（原卫生部副部长），四方面军青年先锋团卫生队队长。

耿万富：离休干部（原营房部副部长），红五军团供给部财务科长。

李桂芳：离休干部（原沈阳军区招待所科长），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二六八团副连长。

吴秉章：离休干部（原后勤营建总队政治委员），四方面军总部通信营一连排长。

董兴谱：离休干部（原八七疗养院副院长），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三师二七四团护士长。

一、部队西渡黄河前的动员

准备工作及行动口号

一、二、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会宁境内会师之后，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包括西渡黄河的任务，经与会同志回忆，多数同志记忆是没有向下做动员部署的，只有李桂芳同志所在的三十军二六八团三营七连在十月下旬过河前三天，召开党支部大会，向党员做了西渡黄河的动员工作，要求党员要保证完成渡河任务。他记得，不仅向党员做了动员，而且还向群众教唱了一首歌，记忆最深的一句词是“接通苏联外蒙古，国际有帮助”。

与会同志都记得，在渡河前，部队中普遍地宣传过一个口

号：“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外蒙古，求得国际援助。”这一口号宣传后的两、三天，部队就开始向靖远方向进军，开始西渡黄河了。

杜海林、林春芳、姚德智同志回忆：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三军会师后，在会宁附近，张国焘召开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据杜海林同志记忆，在会议期间，他看到了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肖克、周纯全、徐海东等领导，会议前两天，还看到了周恩来、朱德同志。会议之后，部队开始宣传“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党中央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部队中是接受了这一宣传的。认为打通河西走廊，求得苏联援助，建立陕北、甘肃、宁夏、新疆抗日根据地，是一条可行的战略方针。

事隔一年左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林春芳同志在延安二十里铺参加了西路军（零散）返回延安人员欢迎大会。会议由彭德怀同志主持，朱德同志参加了会议。陈昌浩在会上讲了话，其中有一段是检讨。他说，张国焘的路线，是我陈昌浩执行的，不怪你们，你们打的勇敢、坚决。责任在我，要撤职，撤我陈昌浩。听了他的检讨，才知道组织西路军，执行西征计划，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莫异祥同志回忆，一九三七年初，三十一军在镇原驻训期间，开始公开批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动员时讲的大致内容是：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发展大西北，赤化全中国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批判他不经过党中央同意，擅自命令三个军西渡黄河；批判他不听从党中央指示。部队过河后，中央指示，河西走廊历史上就有个民族问题，不要再向西深入，可以在河附近打几仗，活动一下，待黄河结冻时返回河东。但张

国焘不听从党中央命令，指示部队继续向新疆方向挺进，造成西路军的惨重失败。

二、渡河次序及组织编成

渡河次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总指挥部，四方面军第九军，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具体时间记不清），相继在靖远上游河包口渡河。

据吴秉章同志回忆，会宁会师之后，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总部就做了西渡黄河的准备。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部队行进到半个城地区时，就听传达说，桥被炸断，船被炸毁，过不去了。朱总、张国焘，由哈达铺经会宁、靖远、打拉池，于同年十一月初进驻红铁城。那时，我们通讯营负责朱总司令、张国焘的警卫工作。莫异祥同志回忆，我们三十一军是经过动员，确定为渡河的部队。因胡宗南部队控制了渡口，转向打拉池同一方面军会合，参加打甜水铺战斗。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末，张国焘在去延安的途中，来到我们军，动员我们好好打仗，进入陕甘宁边区。据没有参加西路军问题座谈的张长安同志提供，一九三六年十月末，我们红军大学随同四方面军总部行动到会宁时，见到周恩来、张浩、徐海东同志来欢迎张国焘，部队张贴了“欢迎中华苏维埃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标语。开了欢迎大会，我们红军大学学员都参加了。张国焘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九军、三十军、红五军团过黄河了。周恩来、张浩、徐海东和陕北来的一位领导人也讲了话。彭德怀同志当时在打拉池，也赶来参加了欢迎会。

组织编成：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下属三十军

三个师，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九军三个师，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红五军团一个师（三七师），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此外有红军干部教导团、妇女独立团、青年先锋团及总部直属队等。总兵力：与会同志多数记忆为两万一千余人。林春芳同志记忆为两万五千余人，当时号称三万大军西进。

三、西路军指战员对党中央电示西路军 回师河东指示的态度和反应

西渡黄河后，第一个战斗是打一条山。据杜海林同志回忆，当时边打边等张国焘、等四军和三十一军渡河跟上来。战斗打了十多天，没有等到，部队就向宁夏方向前进，走了一天半，突然又转回来，改向古浪方向进军。

与会同志回忆，于十一月中旬，九军攻占古浪，三十军攻克永昌，五军团进驻山丹，总指挥部进驻永昌城。

据杜海林同志回忆，在十一月下旬，天已降小雪，西路军在永昌城内，召开了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总部和各军的领导都到了。他见到了陈昌浩、程世才、李先念、董振堂、孙玉清等领导。会议开了三天，交通队给站岗。大家都知道党中央来了电报，说四军、三十一军要来迎接，西路军要返回河东，同一、二方面军会合。还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要求部队轻装，行军锅都不要带了等等。军的领导和大家都很高兴，还准备了锣鼓要庆贺一番。因为进入河西之后，由于地理条件不利，少数民族地区，又是新区，没有党的工作基础，没有后方补给，缺粮少弹。虽然红军战士作战英勇顽强，但终因寡不敌众，古浪一仗，使

九军伤亡惨重，几乎垮掉。如立即返回河东，各军建制还在，每团尚有七、八百人。大家感到中央电示英明，所以高兴。但不久又传出了陈昌浩的意见，大意是西路军已经打到这里了，永昌、临泽、高台一线我们都占领了，要把这一线开辟出来，接通新疆，打通国际交通线，完成西征任务。就这样，回师河东的指示被否定了，西路军继续向西前进。

据林春芳同志回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在部队中传说中央有电报要西路军返回河东，我们也确实往回走了一天多，但又停下来，等候军的领导开会，讨论中央的指示。听说是陈昌浩主持会议，说：中央指示我们打通国际路线，现在又要我们返回去，问大家怎么办？据姚德智同志回忆，会议吵的很凶，陈昌浩都发火了，坚持西进。有人说回去，有人主张继续前进，完成“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会后，部队又返回，向高台方向前进。翌年一月高台之战，红五军团失败于此。军团长董振堂战死在高台县城。

四、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大家认为是多方面的。有路线上的原因，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与会同志当时处于基层人员的切身感受来分析认识，有以下几点：

1. 地理条件不利于我军惯用的游击战运动战。河西走廊南面是长年积雪的祁连山脉，北面是合黎山和龙首山脉，两山之间，宽三、五、六十里不等，形成一条荒山秃岭的狭长地带。部队没有回旋的余地。而马氏军阀的骑兵部队，却可利用这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夹击红军。我西路军从一条山一战之后，

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2. 河西走廊是马氏军阀长期盘踞的地方，即有宗族统治的宗派势力，又有雄厚的军事实力。我军首次进入河西走廊，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回民地域，封建宗族统治很深。加之，马氏军阀的“反赤”宣传，群众对我军不了解。开始时，我军还很注意执行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但打了几个残酷的战斗之后，就不注意了。有的在回民家中杀猪，用回民的锅煮猪肉，群众很反感，不卖给我军粮食，有的埋掉了水井，部队没有吃的，没有水喝。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同数量大于我军四倍之敌作战，虽然我军指战员奋勇杀敌，血战不馁，多次给敌人以重创，但终因敌众我寡，无法取胜。

3. 没有供应补给，没有兵源补充是失败的基本原因。我军当时作战是取之于敌，用之于敌，以战养战。历来是打一个胜仗，开辟一个根据地，补充一部分兵员，扩大红军力量。但进入河西走廊之后，一是失去了以战养战的条件。马氏军阀熟知我军供应无源，敌军每人只发给数发子弹，即使我们打了胜仗，抓到俘虏，但缴获不到子弹，造成红军弹药没有来源，只好用大刀、石头、木棒，甚至把步枪管用火烧红，打成长矛同敌人拚杀。二是急于打通国际交通线，采取推进式的前进，没有做好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所以，物资消耗、伤亡减员无法得到补充。

4. 有的同志认为，西路军过河后直奔新疆，接通苏联，取得助援之后，回过头来建立河西根据地，有可能取得胜利。耿万富同志回忆，我们刚过河时说是借路到新疆去，马家军阀的骑兵部队在我们的两侧，根本不接近我们。原因：一是我们讲的是

借路到新疆；二是敌人的部队还没有完全调来。当时要直去新疆，一个月也就到了，可以打通国际路线。但当时不走，搞皮子、做衣服，结果拖延了时间，敌人集中起来了，最后要走走不脱了。

李桂芳同志回忆，在西路军最困难的时期，一九三七年一月末到二月中旬，敌人还在战壕里向我们喊话：你们借路到新疆去可以，要占领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徐州不行，这是我们的地方。那时如先到新疆，取得苏联的援助，有了武器、弹药，再回过头来建立根据地，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五、关于援西部队的情况

党中央对西路军是关怀的。得知西路军处境艰难，党中央迅速地确定以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和十五军团组成援西部队。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宋任穷为政治部主任。

据莫异祥同志回忆，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在三原地区向援西部队进行了动员，并做了渡河的准备。翌年一月援西部队进驻镇原地区。一月至二月，西路军正处在战斗紧张阶段，亟待援助。但就在一月份，援西部队却宣布不过河了。原因是西路军已经失败，去了也无济于事，搞不好，敌人围城打援，援西部队也有失败的危险。于是，重新下达了援西任务：迎接河西归来的零散人员，不管是哪个军的，都要热情接待，发衣服和日用品；派出化装部队，给河西归来的人员指定行走路线；设立接待办事处。上述任务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部队转回三原整编时方告结束。张长安同志回忆，一九三七年二月，记得是青草刚刚发芽的季

节，我们四方面军第四军在镇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那时我从红军大学分配到四军保卫部当干事，参加了这次会议。刘伯承同志在会上讲话说：“我们援西部队不去河西了。西路军失败了。”讲到这里，刘伯承同志流了眼泪。

有关南方五省农民运动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是：

陈美福：离休干部，原后勤部副部长，江西兴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

葛接调：离休干部，原油料部长，江西于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

熊孟贤：离休干部，原军需处长，安徽寿县人，一九三二年四月参加红军。

陈国璋：离休干部，原五汽校处长，江西莲花县人，一九三〇年七月参加红军。

黄思梅：离休干部，原白城办事处副政委，福建上杭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

傅德胜：离休干部，原军械仓库主任，安徽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

单志辉：离休干部，原黑龙江后勤部长，江西横峰县人，一九三〇年一月参加红军。

刘守仁：离休干部，原军需部副部长，江西省赣县人，一九

三〇年参加红军。

汪 浩：离休干部，原卫生部政委，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三〇年六月参加红军。

谭西元：离休干部，原战俘归管处副处长，湖南耒阳县人，一九三〇年五月参加红军。

张长安：离休干部，原军械仓库主任，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七月参加红军。

董兴谱：离休干部，原疗养院副院长，湖北新州县人，一九三〇年九月参加红军。

钟全友：离休干部，福建蒲城县人，一九三四年五月参加红军。

一、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

从大家座谈的情况看，在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农民运动逐步兴起，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先有地下党的活动，后建立革命武装，如湖北的麻城和黄安等地区。据汪浩、张长安同志回忆，黄安县，一九二一年就有党的小组活动，据说开始是董必武同志在那儿建党，李大钊同志也到那儿去过。以后相继建立农会、青、妇、武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捐抗税斗争。一九二五年黄安农民暴动，各乡成立游击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黄安、麻城举行武装起义，在各地农民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鄂东军。第二种情况，如湖南东南部和江西的赣州地区，在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队伍路过后，不少地区建立了党和农会等组织，开展起农民运动。如陈美福、葛接调和刘守仁等同志谈江西兴国、赣县一带，就是这种情况。黄思梅同志谈，他家乡是福建上杭县，朱

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路过上杭时，邓子恢和张鼎丞等领导人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第三种情况，红军（或农民起义军）还没有到达那个地区，但在附近地区已有了革命部队的活动，由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派人去组织农民运动。如傅德胜同志谈安徽金寨县、钟全友同志谈福建蒲城县和单志辉同志谈赣东北的横峰县的农民运动，大体都属于这种情况。

二、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

当时各地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由于处于不同环境，担当的主要任务也不完全相同。有的以搞政权建设进行反封建活动为主，有的以支援武装斗争或支援前线为主。至于参加座谈会的人，由于当时担任不同职务，负责的具体任务也不一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1. 从抗捐抗税到打土豪分田地

座谈中大家都反映，旧社会农村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地主的残酷剥削，民不聊生，广大劳苦农民生活极其贫困。经过党的教育和发动，真如干柴烈火，农民很快就觉悟和组织起来，斗倒当地一、两个最大的恶霸地主，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熊孟贤同志说，想当年我们村斗了一个姓牛的大地主，事先做好工作，由他的长工里应外合，打开了这个有水围的寨子，当时就分了财物和粮食，接着又分了田，一下子农民就起来了。单志辉同志说，他们第一个斗的大地主叫滕敬堂，外号叫老虎皮，从前可威风呢，就连横峰县伪县长都听他的。农民一起来，给他戴高帽游了街，一下子就威信扫地了，不仅外面名声臭了，家里人也不理他，没过几天就活活气死了。接着，村里成立了苏维埃，广大的

穷苦农民真是扬眉吐气，我们那时是小孩子，真比过年还高兴。

2.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会上不少同志谈，在农民运动中，打破封建迷信是经常性的活动内容。陈美福同志谈的最具体。他说：“在兴国家乡成立苏维埃后，权力大的很，没有不管的事。我参加革命活动后，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农会、妇女会和少共等几个组织各有分工又互相紧密配合。如斗倒地主分田后，要监督改造地、富分子，定期找他们来训话。对政治上异己分子也要进行严密监视；动员青年参军，搞好‘扩军’工作；宣传和禁止烧香跳神、卜卦算命；拉倒菩萨扒庙宇；给妇女剪短长发，不准给小女孩缠足；宣传婚姻自由，不准父母和媒婆包办；抓住同红军家属搞不正当关系的严厉惩罚，对其中情节恶劣、教育不改的，有的被枪毙。家庭不和，婆媳吵架，兄弟分家等纠纷，农会都管。”

3. 支援前线和配合武装斗争

在苏区和白区的拉锯战地区，都把这个任务做为中心工作，当时叫三大任务：（1）搞好生产多出军粮；（2）动员青年参加红军；（3）做好后方支援前线的工作。如陈国璋同志谈，江西三次打莲花的情况，前线打的越激烈，后方工作就越紧张。大部分青壮年当红军走了，没有参军的男人和妇女，除了要种好田，还要监视地富分子的破坏活动；男的要抬担架，给红军带路，女的要照顾伤员，给红军缝衣服、做鞋子。当时对军烈属的工作也做的非常细，政治上、生活上都要给予很好的照顾。事情很多，真是一个人顶几个人忙，但那时群众情绪非常高，人们很少想个人问题，都争着看谁对革命的贡献大。

4. 开展各种活动，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

战争年代虽然环境很艰苦，生活也很困难，有的人家进入春夏之际粮食都接不上来，真是糠菜半年粮。可是村里经常有歌声，组织教唱革命歌曲和一些健康的民谣。陈福美同志讲了许多具体事，还唱了几首歌（唱的歌中有当时配合军事训练编写的站岗放哨和队列动作要领等歌曲）。有的村每周末或逢年过节都要开晚会，青年人上夜校补习文化。有的点气灯，没有气灯的村区就点松明子。同志们说，那时我们大多数同志不认字，也很少去过外村，对什么都感觉新鲜，也很好奇，上面一来人都围着要求给我们讲形势。有的区、县领导干部来能给讲讲苏联的革命故事，就更感到很高兴了。谁出去开会或参加上面组织的集训，回来后都要给大家说说，大家听的都非常认真。那时虽然工作很忙，但大家都迫切要求学习。座谈时有同志说，自己懂的这些革命道理，有不少还是在参加农民运动时学的，到现在还记得挺扎实。

三、当时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

座谈中，据一些同志回忆，在他们家乡一带活动过的有以下领导人。

傅德胜同志回忆，记得在一九二七年的一、二月份，王明在我们村召集过干部和农会会员开会，会上王明讲了话，我也在场。同他一起来的记得还有四个人，是姓丁、陈、傅和姓杜的。王明讲话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革命是怎样搞成的，姓丁的是地主子女，姓陈的是日本留学生，他们俩也讲了话，内容讲的是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不是地主养活农民而是农民用血汗养肥了地主……。一九二七年，举行了黄麻武装起义。在那前后在我们那一带活动

的领导人不少，记得有周维军、肖方、秦德卫、王树声、王树昆、王宏坤、詹才芳、潘忠汝、吴光浩和许继慎等人。对这些人以后的情况，少数还知道，大部分就不知道了。

葛接调同志回忆，曾山、陈奇涵和陈正仁等人，在我们赣州那一带搞过农民运动活动。红军队伍上的领导人是朱学元、钟胜楼、李发观、李聚奎和黄欧东等一些人。离我们那里不远，有四个团，活动在井岗、东固一带，听说领导人姓王，从以后的一些资料上看，可能是王佐。

陈国璋同志回忆，在江西莲花县，当时是红军彭德怀的部队，但我们没见过他。莲花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叫陈兢进，是北区学校的毕业生，经常晚间在我们村开大会发表演讲。当地赤卫队和独立团的领导人刘毅生、陈刚裕、贺福庆和肖希贤等人，以后朱培德下属的一个营起义过来，大部分人同起义部队编到红军主力部队后就开走了。

湘赣苏区主力部队的领导人是肖克、王震、李达等同志。

黄思梅同志谈到福建上杭的情况，县城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号被红军打开的，当时的领导人是邓子恢和张鼎丞，打开以后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和赤卫队。毛主席调查过的才溪是模范乡，以后上杭成为模范县。我就是红军走了以后参加革命活动的，一九三二年四月才参加了红军。

张长安同志回忆，党的不少领导人都到过红安县(黄安县)，我开始知道事时，在那活动比较有名的是王树声、王宏坤、徐海东、詹才芳、邱红甫、赵次五和吴光浩等，以后中央先后又派去了张国焘、陈昌浩、张庆秋(陈的爱人)、徐向前、傅钟、陈赓等人。李先念是黄皮和黄安联合县委书记。成立三十八团时，徐海